doi:10.3969/j.issn.2097-3853.2026.05.003

《闽中新乐府》儿童文学身份不彰之原因探析

郑伟

(福建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通识教育学院,福建 福州 350007)

摘要:《闽中新乐府》是林纾为开启童蒙而创作的一组诗歌,系其早期代表作品,体现了近代诗歌转型的重要特质。长期以来,这部诗集的儿童文学属性未获学界的普遍确认,现有的儿童文学史著缺乏对诗作思想与艺术价值的全面评述。导致这一现象的原因,在于诗集刊行早于梁启超提出“诗界革命”,故而其未被学界纳入晚清“诗界革命”的主流论述,制约了研究者的史学建构视野。后世学者多聚焦诗集在维新思想传播与白话文学层面的贡献,却忽略了其早期在儿童启蒙教育领域产生的广泛影响。晚清时局的急遽变化,尤其是新式学校的兴起,加之诗歌内容未能充分契合儿童的心智特征,也限制了其启发童蒙价值的进一步发挥。多维因素的交织影响,致使这部诗集的儿童文学身份无法得以充分彰显。

关键词:林纾;《闽中新乐府》;儿童文学;身份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2097-3853(2026)05-0424-06

Analysis of reasons for lack of recognition of *New Yuefu in Central Fujian* as children's literature

ZHENG Wei

(School of General Education, Fujian Preschool Education College, Fuzhou 350007, China)

Abstract: *New Yuefu in Central Fujian* is a collection of poems composed by Lin Shu for children's early education and represents one of his major early works. It embodies important characteristics of the transformation of modern Chinese poetry. However, its status as children's literature has not been widely recognized, and existing histories of children's literature lack comprehensive assessments of its intellectual and artistic value. One reason is that the collection was published before Liang Qichao proposed the "Poetry Revolution" (shijie geming) and was consequently excluded from mainstream scholarly discussions of the late Qing Dynasty's poetic movement, thereby limiting researchers' perspectives on literary history and its construction. Later scholars have focused primarily on the collection's contributions to disseminating reformist thought and developing vernacular literature, overlooking its early and far-reaching influence on children's education. Meanwhile, rapid social changes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particularly the rise of modern schools, together with the poems' failure to fully align with children's cognitive and psych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further constrained their potential to inspire and educate young minds. The interplay of these factors has prevented the collection's significance as a work of children's literature from being fully recognized.

Keywords: Lin Shu; *New Yuefu in Central Fujian*; children's literature; identity

中国儿童文学的近代历史叙事,一般都会涉及晚清“诗界革命”在儿童诗歌上取得的成绩。林纾的《闽中新乐府》(以下简称《新乐府》)是近代新式诗歌创作的重要收获,诗人追求“以歌诀

收稿日期:2025-01-26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23BZW170)
作者简介:郑伟(1964—),男,福建福州人,教授,硕士,研究方向:现当代文学、儿童文学。

感人”,通过批判社会陋习,以启发童智、鼓舞人心。这一以儿童为读者对象的诗作理应在近代儿童文学史上留下浓重的一笔,但长期以来,儿童文学史著对《新乐府》的介绍都十分简要,甚至不置一词,更缺乏对其整体艺术面貌和诗歌史地位的全面分析与评价。林纾研究界对《新乐府》的研究虽不乏卓见,但较少从儿童文学的视角加以探讨,《新乐府》的儿童文学身份在整体上显得模糊不清。深入探析这一现象产生的多重原因,有利于完善儿童文学的史学建构,对进一步探讨林纾的早期创作也有所助益。

一、诗界革命先锋的时运

儿童文学是现代性的产物,现代意义上的儿童文学发轫于整个近代文学的发展进程之中。儿童文学界把以梁启超、黄遵宪为代表的晚清“诗界革命”理论主张,以及其与童年生活相关的诗篇纳入了历史叙事,但一直未充分关注到彰显近代诗歌新风的《新乐府》,这首先与林纾长期未能进入“诗界革命”的主流论述有关。

1900 年 2 月梁启超在《清议报》上以“任公”为笔名发表《汗漫录》(后改名为《夏威夷游记》,收入《饮冰室合集》),可视为晚清“诗界革命”的标志性事件。其核心观点是:“欲为诗界之哥伦布、玛赛郎,不可不备三长:第一要新意境,第二要新语句,而又须以古人之风格入之,然后成其为诗。”[1]2263梁氏对“诗界革命”前景表达了乐观态度:“吾虽不能诗,惟将竭力输入欧洲之精神思想,以供来者之诗料可乎?要之,支那非有诗界革命,则诗运殆将绝。虽然,诗运无绝之时也。今日者,革命之机渐熟,而哥伦布、玛赛郎之出世,必不远矣。”[1]2265梁氏对“诗界革命”的命名以及诗歌创作“三长”的倡导,无疑产生了巨大影响,但近代诗歌的整体变革并非仅仰赖此刻的惊雷一呼,而是在“西风东渐”的时代大势下逐步达成的。追求语言通俗化,凸显主题现实性,关注新生事物,是 19 世纪中后期诗歌趋新求变的时代动向。在这一历时半个多世纪的进程中,大量的新式诗歌创作实践最终促成了“诗界革命”高峰的到来。林纾正是诗歌创新的重要践行者,《新乐府》就诞生于“诗界革命”成为一个广受关注的文学事件前夕(初版于 1897 年),这显示了林纾思想的先锋性,同时也因面世时间节点上的差池,长期未被置于“诗界革命”主流论述的重要位置。

近年,胡全章对林纾在近代诗歌变革中的先锋地位做了更为清晰的评价,指出《新乐府》虽刊载于“诗界革命”口号提出之前(1898 年 3 月—5 月连载于《知新报》),但“其题旨和诗体特征又大体符合梁启超其后提出的‘诗界革命’的创作纲领与革新方向,且对其后梁氏策划《新小说》诗歌专栏及该杂志刊发的一批新乐府诗歌有着示范意义,洵为诗界革命之先声”[2]。他还从发表时间的错位上谈及《新乐府》历史地位的尴尬境遇:“《闽中新乐府》原本是梁氏倡导的‘诗界革命’之先声,却又因其刊行过早,加之澳门《知新报》长期以来难见其真面目……以致后世文学史家鲜有将《闽中新乐府》与‘诗界革命’联系起来加以考察者。”[3]

尽管林纾研究界对《新乐府》的诗歌革新意义多有论述,近来研究者也进一步厘清了林纾的诗界革命先锋地位,但长期以来,儿童文学界基本上参照主流的“诗界革命”历史论述来描述儿童诗歌的近代萌发,《新乐府》作为早期儿童诗歌重要代表作的身份,在儿童文学史著中并未获得充分的彰显。王泉根的《中国儿童文学史》(2019 年)在“晚清儿童文学开放、刚健的格局”一节中,谈及梁启超、黄遵宪的儿童诗创作,未涉及《新乐府》。张永健的《20 世纪中国儿童文学史》(2006 年)设有“梁启超的儿童文学理论及创作”“黄遵宪的儿童诗”专节,仅在“五四前的儿童文学概述”中简单提及《新乐府》。蒋风的《中国儿童文学史》(2019 年)对《新乐府》的介绍稍显详细,交代了刊行时间,引述了“自序”,肯定了其启蒙意义。但张、蒋两部史著仅引用了《村先生》中的几句诗,未对《新乐府》的整体思想与艺术面貌做说明,更未全面评价其在儿童诗歌发展史上的重要地位。胡从经的《晚清儿童文学钩沉》(1982 年)对近代儿童诗歌及“林译小说”多有阐发,但未涉及《新乐府》。谢毓洁的《近代儿童文艺研究》(2017 年)提及《新乐府》,也仅寥寥数行文字,其文献来源转引自“小说理论资料”中邱炜菱《茶花女遗事》一文,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新乐府》在儿童文学界的“陌生”状况。杜传坤的《中国现代儿童文学史论》(2009 年)将《新乐府》置于“诗界革命”诗学主张的背景下加以介绍,指出:“这本诗作被传诵一时,想必也不仅仅在于其‘通俗的白

话',更在于它所传达的忧国之情爱国之志对儿童的教育作用……这种浓郁的启蒙功利意识,以及其中体现出的新意境、古风格,其实已经预示了整个晚清民初时期儿童诗歌的基本特征。"[4]在儿童文学与"诗界革命"的双重视域下,对《新乐府》做出这样的评价,实属难能可贵,可惜杜著对《新乐府》作品的分析,仅限于《村先生》。

颇有意思的是,从儿童文学视角对《新乐府》传播与接受状况进行系统阐释的成果,出现在台湾儿童文学的研究中。贺迪的《台湾儿童文学的中华民族叙事研究(1895—1945)》,系统梳理了《新乐府》辗转入台的路径,呈现了《新乐府》在《汉文台湾日日新报》《台湾日日新报》上的刊载情况,并对其在日本殖民统治时期发挥的中华文脉传承作用给予了评价:"乙未割台后,梁启超、陈荣衮和林纾的儿童观、儿童教育和儿童读本新思想在台湾的传播与接受,反映了台湾文人即便身处日本殖民统治之下,仍然努力通过不同途径从祖国汲取新知……台湾文人也在近代中国儿童读物的革新脉络之下,延续了中华文化传统。"[5]一项地域性儿童文学研究之所以能充分关注到《新乐府》的儿童文学身份,除了研究者深入发掘史料的努力,研究语境与近代"诗界革命"主流学术话语的间离,也有可能在其间发挥了独特而积极的作用。

我们不妨对"诗界革命"历史叙事的主流话语做简要分析,以探析其如何对《新乐府》的儿童文学身份产生了干扰。

白话写作的兴起是现代儿童文学诞生的基本条件,儿童诗歌追溯自身近代渊源时,自然尤为关注黄遵宪"我手写我口"的创作主张。这是诗人1868年(时年21岁)所作《杂感》中的几句:"我手写我口,古岂能拘牵。即今流俗语,我若登简篇。五千年后人,惊为古澜斑。"胡适对《杂感》给予了高度评价:"这种话很可以算是诗界革命的一种宣言。末六句竟是主张用俗话作诗了。"[6]作为白话文学运动的重要领袖,胡适的评价无疑深刻影响了后人对"诗界革命"的历史描述。儿童文学史基本沿袭这一观点,将黄氏早年的诗歌口语化倡导视为近代儿童诗歌萌发的重要理论资源。黄氏晚年创作了《幼稚园上学歌》《小学校学生相和歌》《军歌》等以学童为读者的诗篇,这些作品经梁启超《饮冰室诗话》的摘引与评价,获得广泛传播,自然成为儿童文学近代历史叙事的基本材料与依据。强势的历史思维惯性对《新乐府》的儿童文学身份形成了一定的遮蔽效应。

梁黄二人关系甚密,是晚清维新的同行者,也是"诗界革命"的共同倡导者与践行者,梁对黄诗歌创作的高度关注与评价是十分自然的事。令人不解的是,梁启超为何没有对《新乐府》所显示的诗歌新质做出及时的回应?在《知新报》开始连载《新乐府》的第46册上,也载有梁氏征捐图书的启事,他很可能此时就已读到了《新乐府》。如果说此时(1898年3月)距梁氏在旅行日记《汗漫录》(1899年12月)中构划"诗界革命"设想尚有一年多时间,林纾的诗作还不足以令他产生足够的兴趣,那么,当1900年2月《汗漫录》在《清议报》上公之于众后,期待"诗界革命"取得实绩的梁启超,理应回想起曾在《知新报》上连载数月的《新乐府》并将林纾引为同志,以壮"诗界革命"之声势。梁氏是《知新报》主事者之一,该报之后开辟的"诗词随录"栏目,成为呼应"诗界革命"号召的重要阵地,而在此之前,"闽中新乐府"曾是《知新报》上唯一的诗歌栏目。现有文献无法回答这个不解之惑,历史虽不容随意假设,但可做合理推演:倘若《新乐府》当时成为"诗界革命"领袖的评说对象,其历史形象或许会是另一番模样,进而言之,梁氏不知何故的忽视,可能是《新乐府》儿童文学身份不彰的原因之一。

二、不同时期的传播效应

《新乐府》为学塾童子而作,归入儿童诗歌范畴,实属常识。从最初的传播情况看,也符合儿童文学的身份特征。林纾在自序中言:"闲中读白香山讽喻诗,课少子,日仿其体作乐府一篇,经月得三十二篇。"[7]102说明诗作是在"课子"过程中逐篇写就的。为林纾刊行诗集的魏瀚,最初也是出于学塾教学之需:"余见而求其稿,将镌板以授予家塾……使吾子弟读之,亦知有人间之事,不死于帖括之手,为功岂不伟乎。"[8]5于是不顾林纾再三辞让,"乃强取而授之梓人"。[8]5经由林魏二人之手,《新乐府》从私人授课读本转化为社会影响甚广的诗集。

高梦旦鉴于《新乐府》刊行后受欢迎的情形,致信在上海主持报务的汪康年:"林琴南近撰《闽中新乐府》三十首,大概用以振作童子志气,并屏除陋习,颇便蒙学。此间传抄者多,拟讬尊处代印。"[9]时隔半个多月,为印行之事,他再度致信

交办:“石印既贵且缓,应如尊意,用活字版排印千册,以速为妙。”[9]

旅居新加坡(时称星洲)的闽籍文人邱炜菱在《新乐府》早期传播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邱氏在笔记文集《挥麈拾遗》中两次评价林纾诗作并谈及翻印传播情形。其一是:“如《闽中新乐府》一书,养蒙者所宜奉为金科玉律,余已为之翻印,赠贻岛客,复采其专辟乡里陋俗之数题,载入《五百石洞天挥麈》。”[10]91-92其二是:“至所著《闽中新乐府》一种,以西辅中,布新除旧,皆从本原上着想,取径虽迂,收效甚大,以教国人,必能兴顽立懦,词句隽永,则复媲美乐天。余既摘采入挥麈中,并为翻印单行本,年来南洋童塾,多有供作课程。”[10]133-134从中可见邱氏对《新乐府》的赏识,不但摘入个人文集,还亲自翻印,供作学塾教材。前者见于作者对林译小说的评议,被阿英以“客云庐小说话”收录于《晚清文学丛钞·小说戏剧研究卷》,常被引用。后者因《挥麈拾遗》一书较为稀见,较少受到关注,但所展示的《新乐府》早期海外传播情形,实则更显具体、明晰。

《新乐府》的早期传播效应还反映在报刊转载上。1897 年 2 月创刊于澳门的《知新报》是维新派的华南宣传重镇,该报从第 46 册(1898 年 3 月 13 日)开始刊载“闽中新乐府三十二首”,署名“闽中畏庐子”,开篇有林纾所撰序言。此后,分别于第 47、第 48、第 50、第 55 册连载,历时三个月。《知新报》的刊载对《新乐府》的传播发挥了重要作用,该报发行遍及海内外,东南亚、日本、北美设有发行点。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一些开明的地方官员为拓眼界、新民风,还发公文订报,供下属及学子阅读,如《杭州府林太守饬属购阅知新报札》(《知新报》1898 年,总第 48 册)、《兴化府张太守购时务知新报发给书院示》(《时务报》1897 年,总第 33 册)、《广西洋务总局司道饬全省府厅州县购阅知新报札》(《时务报》1897 年,总第 28 册)。官方的加持有助于报刊影响的扩张。

在早期传播中,《新乐府》的儿童文学身份是较为清晰的,林纾、魏瀚、邱炜菱将其授予学童,《知新报》刊载时也附上林纾阐述创作动机的序言。随着翻译事业的勃兴,林纾结束了多年的“村学究”生涯,世人对他的认知与评价转向影响日盛的译作。林纾最为看重自己的古文与翻译,鲜有提及早年诗作,也未将其编入《畏庐诗存》,这也致使《新乐府》的影响式微。而导致《新乐府》儿童文学身份不彰更为重要的原因,则是后人评价《新乐府》视角的转变。

1924 年秋林纾去世后,通过郑振铎、胡适等的缅怀文章,沉寂多年的《新乐府》再次回到公众视野。郑振铎的《林琴南先生》将《新乐府》作为林纾思想进步的佐证:“在康有为未上书之前,他却能有这种见解(指《新乐府》中反映的维新思想——笔者注),可算是当时的一个先进的维新党。”[7]156但郑文对《新乐府》的文学价值评价不高:“林琴南先生自己的作品(包括自创小说——笔者注),实不能使他在中国近代文坛上站得住一个很稳固的地位。”[7]156胡适的《林琴南先生的白话诗》影响更广,他在文中赞许了《新乐府》白话诗歌探索上的积极意义:“我们这一辈的少年人只认得守旧的林琴南,而不知道当日的维新党林琴南;只听得林琴南老年反对白话文学,而不知道林琴南壮年时曾做很通俗的白话诗——这算不得公平的舆论。”①郑胡二文选录的数首《新乐府》,如《村先生》《兴女学》《破蓝衫》,恰是与儿童教育关系最为密切的诗篇,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保种救亡、揭弊兴国的晚清主题已渐失传播意义,反映童年生活诗篇的文学史价值得以浮现,尽管著文者未必意识到这一价值的存在。值得注意的是,20 年代初正是郑振铎从事儿童文学编辑与创作的高峰期,他在《时事新报·学灯》上开辟“儿童文学专栏”(1921 年 7 月),创办《儿童世界》杂志(1922 年 1 月),主编商务印书馆《童话》丛书第三集(1923 年 1 月),在《小说月报》上开辟“儿童文学”专栏(1924 年 1 月),等等。这些文学业绩均具开创之功,作为现代儿童文学事业的重要开拓者,郑氏理应对《新乐府》在近代儿童文学史上的地位做出积极的评价,但他认为包括《新乐府》在内的林纾“自己的作品”无法在近代文坛上占住“稳固的地位”,显然忽视了《新乐府》最初的儿童文学身份,而只关注其维新进步价值。

郑振铎、胡适评价《新乐府》的言论,对后来的林纾研究有重要影响。在后继的大量论述中,《新乐府》的思想启蒙与社会批判意义得以不断

① 见胡适所著《林琴南先生的白话诗》,收录于 1924 年出版的《晨报六周纪念增刊》,第 268 页。

强化,而其最初的童年文学教育功能则被淡化直至消退。20世纪90年代初,有研究者在描述《新乐府》传播情形时,做了这样的表述:“林纾早期的诗集《闽中新乐府》,一八九七年在福州刊行后,虽然受到欢迎,但是并未造成全国性的影响。郑振铎最早地向全国读者介绍了这部别开生面的诗集,比胡适为林纾写的纪念文章《林琴南先生的白话诗》还要早些。”[11]论者显然对《新乐府》的早期传播缺乏了解,把郑振铎对已故前辈的缅怀当作最早的传播之文。这与《新乐府》近代儿童诗歌身份的逐渐消弭不无关系,《新乐府》的儿童文学历史面貌在数十年后变得愈发模糊不清。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林纾研究都忽视了《新乐府》的儿童文学身份。黄榕官在20世纪80年代就认为:“从集中诗歌的思想内容和艺术形式看,完全是一种近代儿歌,属于儿童文学范畴。……《闽中新乐府》在我国近代儿童文学——儿歌的创作上也有过筚路蓝缕的草创之功。”[12]张俊才在20世纪90年代初的评说则更为系统:“在维新运动的高潮中林纾能着眼启蒙,有意为儿童写作,其用心是难能可贵的。……就其内容来说无疑是当时中国最富有新思想的儿童读本了。单是这一点,如果有人要编撰近代中国儿童文学资料,林纾就是不该被忘记的角色了。”[13]58也有研究者对《新乐府》的儿童文学身份价值做出了反向论述:“这部诗集,明明是对准整个社会,为整个社会的广大读者群而作,……然而,林纾本人却拘谨地限制了读者的范围,说成该诗集只是童子的家塾读本。”[14]这显然忽视了儿童在近代思想启蒙中的重要地位,包括林纾在内的晚清维新派都视儿童为民族的未来,“启童蒙”乃“启民蒙”的前提与根基。总体而言,《新乐府》的传播历程充满了各种时代际会,学界对其儿童文学的身份认知多元且复杂,也不乏疏失,这正是当下仍需对其历史文脉演绎进行系统梳理的意义所在。

三、诗歌意旨的时代错位

《新乐府》儿童文学身份不彰的原因,除以上所及的外部因素外,还应发掘诗歌文本本身有碍于影响力持续增值的内在因素。

应当看到,晚清社会思潮与政治时局的急遽变化,对《新乐府》的进步价值具有不小的杀伤力。以《小脚妇》为例,“左靠妈妈右靠婢,偶然蹴之痛欲死”写出了女性受缠足戕害的切身痛楚,具有很强的感染力。更具深刻性的是,亲手造就女儿痛苦的母亲,却深陷其害而不自知:“阿娘转笑慰娇女,阿娘少时亦如汝,但求脚小出人前,娘破功夫为汝缠。”其中的“笑”字尤具反讽意味,道出不幸遭遇代际相传的时代悲剧。以“诗界革命”的“三长”标准衡量,虽谈不上新境界、新名词,但具备了鲜明的新情感与新思想。尤为可贵的是,《小脚妇》还产生了切实的社会革新效果,《闽清县志》为此留下一则珍贵记录:“妇女缠足之恶习,非特毁伤身体,亦弱种之一大原因。闽清自清光绪中叶得林琴南先生《戒缠足新乐府刊本》,阖邑传诵。又经龙江山长江畬经提倡风气,发起天足会,由县而乡,逐渐禁革,近时三村弓鞋已绝迹矣。”①而仅隔数年(1902年2月),重启新政的清廷就下旨解除妇女缠足。辛亥之后,政府更是颁布法令予以禁绝,《小脚妇》曾经的现实批判光芒自然也就不再耀眼。

林纾在《村先生——讥蒙养之失也》《破蓝衫——叹腐也》中对旧式教育的批判,也随着科举的废除、学校的兴起,现实批判意义大为衰减。尽管今天我们依然可以从中了解历史、欣赏文学品味,但置身当时的时代现场,诗歌意旨与快速变化的社会潮流之间的错位,显然有碍《新乐府》影响力的进一步增值,也不利于其儿童文学身份的普遍确认。同样,《新乐府》涉及内政、外交、兵制、宗教、吏治的时政话题,以及溺女、虐婢等社会陋习的相关诗篇,大抵也都面临类似的时代命运。

后人的一些序跋、笔记和纪念文章,也反映了《新乐府》的时代境遇变迁。友人高梦旦感慨道:“迄今三十年,散失殆尽。侄女君珈独有一册。”[8]5胡适的《林琴南先生的白话诗》就得益于高氏赠予的材料:“现在此书的印本已很不容易得了。……高梦旦先生写信给我,说他家中有人从破纸堆里捡得此书。高先生选抄了一部分寄给我。”②闽籍文人黄濬留下三则关于《新乐府》的笔记体短文,所回忆的藏书情形与高胡二人相似:“予尚记其版本行数,此书己酉、庚戌尚在北京寓中,其

① 见《闽清县志》,1921年闽清修志局初版,1988年闽清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再版,277-278页。

② 见胡适所著《林琴南先生的白话诗》,收录于1924年出版的《晨报六周纪念增刊》,第268页。

后不知如何佚去。”[15] 有趣的是,黄氏已不再关注《渴睡汉》“讽外交者勿尚意气”的批判题旨,仅以“我闻西人礼数多,一涉国事争分毫”两句诗为引子,娓娓叙谈起中西礼仪差异的种种趣事。由此可见社会氛围改变对《新乐府》初始价值的消解。

林纾创作《新乐府》之时,光绪帝是维新变法的希望所在,诗中流露出的忠君情感是可以理解的,如“臣思皇帝忧民瘼,不知此辈穷形恶”(《关山虎》)、“寸心日日恋皇帝,归乡无路惟流涕”(《番客来》)。随着时光流逝,这些诗句就显得不合时宜,对皇权的歌颂也构成了与时代精神的错位关系。一方面,《新乐府》的维新启蒙意旨很快与时代新局产生了错位,其进步意义的衰减显然有碍于影响力的增值。另一方面,随着现代儿童文学走向成熟,逐步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文学审美标准,《新乐府》要通过文学经典化机制的淘沥,也面临着不利因素。张俊才在 20 世纪 90 年代初就意识到这一问题,他基于儿童文学的学科立场,恰如其分地分析了《新乐府》与当代儿童文学之间的审美隔阂:“当林纾写作《闽中新乐府》时,除了注意‘歌诀’——通俗性——这一特点外,在儿童文学应具备的其他方面,如趣味性、想象性上,几乎可以说是无所作为。”[13]58

除了社会时局的急剧变动,诗歌本身的发展也很迅速。被儿童文学史普遍确认的黄遵宪的《幼稚园上学歌》《小学校学生相和歌》《军歌》等作品,写于 1902 年左右,距《新乐府》刊行于世也不过数年,但在内容和语言上就呈现出迥然不同的面貌。以《幼稚园上学歌》中的一首为例:“春风来,花满枝,儿手牵娘衣。儿今断乳儿不啼,娘去买枣梨,待儿读书归。上学去,莫迟迟。”这样的诗歌语言与现代儿童诗已有许多共通之处,诗作的歌咏内容已是日益兴盛的现代学校,而非《新乐府》中的传统学塾。这些艺术进步得益于黄遵宪为呼应“诗界革命”而提出的“新体诗”概念:“名曰‘杂歌谣’,篇幅长短不一,句式、字数多少不等,艺术风格多种多样。在内容上,他要求‘弃史籍而就近事’。”[16] 他践行“新体诗”理念而创作的诗篇,被梁启超称为“一代妙文”并在《饮冰室诗话》中摘引发表。即便如此,黄氏在“杂歌谣”名义下创作的诗歌,以当今的儿童文学审美标准衡量,其中的大部分作品也仅具备历史价值,并不适合在当代环境中传播。

不论是林纾还是黄遵宪,他们的近代儿童诗歌首创之功都应被历史铭记。他们的诗作未能更深地走进儿童文学的经典行列,并非个人的才华使然,而是与近代文学本身的过渡性特征有很大关系,动荡的时代环境亦不利于文学艺术的深潜积淀。“诗界革命”作为一个文学运动,尽管应者如云、见解纷繁,但其高峰期的持续时间却十分有限,难以在诗歌艺术的创新上取得更大的成绩。进入 20 世纪后,梁启超等的政治维新思想很快就让位于更为激进的社会革命主张,梁的思想光谱也由进步滑向保守,在此背景下,“诗界革命”也就难以为继。宣统年间及民国初年,梁启超创办的《国风报》(1910 年)和《庸言》(1912 年)上,均设有“文苑”栏目,但关于“诗界革命”的言论却已不见踪影。“在《清议报》《新民丛报》上高标‘诗界革命’精神的梁启超,与此刻在《国风报》《庸言》上与同光体诗人修禊酬唱的梁启超,直是判若两人。……梁启超对于诗学传统的认识和自身诗学思想的定位使他对传统产生了认同。”[17] 从儿童文学的角度看,“诗界革命”的创新努力并没有改变古典诗歌的基本体式,现代白话自由体儿童诗的创生还应归功于新文化运动。

除以上所及,《新乐府》儿童文学身份不彰,还有一个更为根源性的原因:《新乐府》传播初期,学科意义上的儿童文学概念尚未成型,知识精英与社会公众均缺乏自觉的儿童文学意识,随着时代变迁,自然导致《新乐府》原初身份的模糊暗昧。加之《新乐府》虽为儿童而作,但大部分诗篇并未关涉儿童生活,致使模糊的认知取向得以强化。

四、结束语

对《新乐府》儿童文学身份问题的讨论,不仅事关儿童文学的史学建构,也是对近代“诗界革命”历史演绎脉络的一次重新梳理。一个多世纪围绕《新乐府》的知识生产中,儿童文学这一重要维度的缺位,导致儿童文学的历史叙事缺失了重要一环,也让林纾研究少了一个独特的学术视角。重返林纾初登文坛的历史现场,厘清其“少作”在传播、接受过程中被时代风云遮蔽的细节,探析其中的文脉肌理与演绎路径,于笔者而言,是一次真诚却未必成功的学术探险,期待后来者更具智慧眼光的打量与评判。

(下转第 460 页)